

《晋察冀日报》首刊“五一口号”

□ 郑学富

二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机关报《晋察冀日报》，于1948年5月1日在一版头条首刊“五一口号”，题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右上为毛泽东主席侧身头像。“五一口号”的发布，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发动主动进攻，相继取得一系列重要军事胜利成果。为迎接全国胜利，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陕北关隘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4月11日，毛泽东抵达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而此时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愿望和自觉选择。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一个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严肃政治课题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到了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面前。

按照惯例，每年“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外发布有关纪念“五一”的专门决定，或发表宣言、口号，或举行集会、游行，或刊发文章、社论。新华社的前身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1937年1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中社更名为新华社。1947年3月，党中央机关撤离延安，新华社留下小部分人员组成工作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转战陕北，大部分人员转移到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东四村坚持工作，社长为廖承志。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母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何香凝。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承志愤而脱离国民党，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5月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9月任新华社社长。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廖承志给中央发来一个十分简短的电报，请示中央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廖承志的这封简短电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是通过“五一口号”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于是，“五一口号”初稿应运而生。

1948年五一前夕，中央宣传部门拟定的“五一口号”初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其逐字逐句进行审核，修改的地方多达27处，重要之处有四处：一是将新华社电头由“总社”改为“陕北”。这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迷惑敌人，使其以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机关还在陕北转战，以保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驻地的秘密。二是将初稿第四条“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修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样进一步强调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要同舟共济，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三是将初稿第五条原文“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广泛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删除，重新起草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短短51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建国方略。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建立新中国、成立新政权。体现了革命家、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充分考虑到了建立民主国家的合法程序，表现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四是将初稿的第二十三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二十四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万岁”划掉，将第二十五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改为第二十三条。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谦虚谨慎；体现了共产党人不一党之私，而是天下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字字千钧，皆有深意。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城南庄会议），这是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会合以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即通过了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这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即移住西柏坡。

三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为《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刊，后来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1940年11月，《抗敌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抗战期间，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中和极其简陋的工作条

件下，《晋察冀日报》工作人员利用广泛的消息源，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源源不断地获取消息、长年坚持出版发行，担负着开展抗战政治宣传的重要使命，积极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和战况战果与根据地民主建政的重大成就，指导边区的抗日斗争。该报刊登的《狼牙山五壮士》《平西跳崖五烈士》《爆炸英雄李勇》《回民支队的母亲——马老太太》等新闻报道，极大地激励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当时《晋察冀日报》社驻地在新房村，离城南庄只有一公里远。因《解放日报》已于1947年3月中央撤离延安而停刊，中央发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晋察冀日报》刊登。因此，《晋察冀日报》成为首刊“五一口号”的报纸。1948年4月30日，邓拓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到城南庄参加紧急会议。邓拓立即赶到城南庄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把装有“五一口号”手稿的信封交到邓拓手中，让他拿去立即打印。邓拓回到报社打出清样后，又在深夜时分送到毛泽东处审阅。据时任《晋察冀日报》编委会编委、编辑部副部长陈春森回忆：“快到中午的时候，晋察冀日报社接到上级任务，中央要求‘五一口号’一定要保证在5月1日当天见报。那天我是值班编辑，由于这个任务特别重要，邓拓也来到编辑室和我一起值班。从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们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晚上10点刚过，毛主席审定的稿子终于送到了。事不宜迟，邓拓和我马上进行编排，迅速送印刷厂排出小样，我们再将小样反复校对，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凌晨，刊登着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在印刷厂开机印刷。那天晚上，从社长、总编到编辑、排版和印刷工人，大家都没有合眼，整整忙碌了一夜，待报纸印刷完毕已是东方大亮。我们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在5月1日那天迅速将刊登有‘五一口号’的《晋察冀日报》发放出去。”

新华社广播电台也于当日全文播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等解放区报纸也纷纷全文刊发。随着电波和报纸，“五一口号”迅速传播到海内外，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地讨论。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他们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口号”“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拒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各界各阶层热烈响应，纷纷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围绕召开新政协问题贡献意见，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新政协运动。此后，许多代表人物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纷纷到达解放区，1949年9月参加新政协，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贡献。

中共红色金融机构最早发行的货币

□ 周铁钧

贺尔康，湖南衡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来到衡山县组织、发动农民运动。他通过深入考察，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柴山洲村秘密建起农民协会小组，培养、发展进步农民文海南、夏仁和、夏兆梅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柴山洲村党支部。

1926年2月，北伐军攻占衡山县，柴山洲村党支部领导的农民协会公开成立，贺尔康、文海南等人带领广大贫苦农民揭竿而起，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劣绅，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对剥削、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但由于上一年度湘江洪水肆虐，临岸的柴山洲村颗粒无收，到了春天，贫苦农民几乎家家断炊，打土豪分得的粮食也难以度过饥荒。村党支部根据中共“四大”提出“设立农民银行”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发布的：“由各乡村自治机关用地方公款办理乡村农民无息借贷局”等相关指示，向衡山县县委呈交建立农民银行的请示：“柴山洲三面滨河，地势低洼，连年早涝成灾……促使一般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生计愈促，莫可如何。属部有见及此，特筹建农民银行，以图补救。”

“请示”得到批准后，贺尔康等人首先组织成立了农民银行筹备处，将农会所掌握没收豪绅侵吞的公产、祠产，在减租减息斗争中扣押罚没的款物，向富户的派捐等，折合钱款共近6千银元，全部用作银行启动、周转基金。同时制定以“拥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持生产”为宗旨的12章章程，其中规定：“只向雇农、佃农、小商人、手工业者等贫困群众发放贷款。月息5厘，借额5元内不需抵押或担保，对地主、富户一律不予借贷。”

1926年4月，柴山洲农民银行正式挂牌，同时发行面额壹元的布质货币。原来，在筹建银行时，贺尔康从县中学请来一位美术教师，利用白布布柔韧透气、着色耐腐的特点，在上面设计出长4寸、宽2寸的钱币图案：花纹框内有“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字样，中间是五星、镰刀斧头徽标和“壹元”大字以及编号、年份，盖有“农民银行”公章和经理文海南、副经理夏兆梅的私章。

在没有印刷纸币的条件下，“壹元”布币是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机构最早发行的货币，它质地柔软，极易隐藏和方便携带，等值一块银元，在衡山、湘潭、株洲等县域流通，深受百姓欢迎。

为不断加大发行数量，银行选出两名心灵手巧的职员专门绘制布币，画完百余张后，分别持有私章、公章的文海南、夏兆梅与会计夏仁和聚到一起，在大家见证下，将印章逐一盖在布币上，方可发行流通。

农民银行将布币借贷给贫困群众，资助他们购置各种生产物资及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在解困济难、平抑粮价、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当时，许多豪绅、富户和奸商囤积了大量稻米，伺机哄抬粮价。农民协会和银行就采取动员、勒令等措施，用布币向他们平价收购囤粮，然后将粮食折合成贷款发放。据资料记载，农民银行成立3个月，就用“以粮抵贷”形式为断炊的农民发放稻米10余万斤，农民秋后再向银行还款或还粮。这种借贷方式，解决了许多贫苦百姓的燃眉之急，而售出粮食的豪绅、粮商处于不信任的心态，急于花掉布币，从而活跃市场贸易，加速了货币流通，让农民摆脱了物价混乱的盘剥、高息借贷的压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

衡山柴山洲农民银行的建立，最早的货币发行，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市场交易开始繁荣、人民生活趋于稳定，湖南各地在开展农民运动中纷纷效仿，如：1926年，先后创办了浏阳县浏东平民银行、醴陵县地方银行、沅江工农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虽经营范围较小、存在时间不长，却意义非凡，它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的重要工作实践，给红色政权开创、发展金融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国革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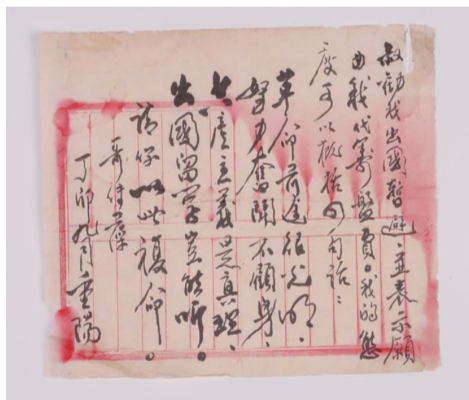
红色记忆

洪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洪湖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直至付出生命。在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有一件革命文物：熊传藻烈士家书，虽然仅剩一页，但字里行间那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不顾身的革命信仰，那诗句中的铿锵誓言，令人激情满怀，充满敬意。

熊传藻（1900—1929），号复之，乳名南阳，又名焕藻，还曾用名刘仁镜、杨家华等，湖北省沔阳县（今洪湖市）傅湾人。熊传藻9岁就读于私塾，后入新堤第三高等小学。1917年9月考入武昌荆南中学。1919年，他和学友们参加了武汉地区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熊传藻受董必武委派，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到洪湖新堤，秘密发展党员，领导工人、农民运动。创办并主编了《沔水周刊》，撰写了《光明之路》等文章，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大。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湖北省委派肖仁鹤来到沔阳地区，在新堤正式成立了中共鄂中南部特委，肖仁鹤任特委书记，熊传藻、邓赤中、刘崇龙等为特委委员，领导和发动鄂中地区的秋收暴动。1927年9月10日，鄂中特委和沔阳县委领导的戴家场暴动打响了鄂中秋收暴动的第一枪后，又连续举行了20余次暴动，其中熊传藻主要领导了螺山暴动、傅家湾渔民暴动和周何湾渔民暴动，开辟了早期洪湖西岸到口、周何湾根据地，为洪湖革命根据地地和湘鄂西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10月，鄂中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熊传藻任第二师师长。随后，鄂中特委决定集中武装力量，以沔西拖船埠为中心，展开土地革命。不久，熊传



熊传藻烈士的亲笔信

藻调任中共监利县委书记。这一时期，洪湖革命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熊传藻的叔父出于对其安全的考虑，曾写信给熊传藻，劝其脱离共产党，并愿意出资帮他出国留学避难。熊传藻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便于1927年10月4日（重阳节）给堂弟熊栋臣写了一封家书，谢绝了叔父的好意，表达了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到底的坚定决心：“叔劝我出国留学，并表示愿为我代筹盘费。我的态度可以概括四句话：革命前途很光明，努力奋斗不回头，共产主义是真理，出国留学岂能听。请你以此复命。哥传藻，丁卯九月重阳。”信纸为毛边纸上下段竖红格老式账页，长22.5厘米，宽20厘米，横式长方形，竖格15行。文字内容为行书10行，每行3—12字不等，连标点共79字。信纸上套印之红竖格已漫漶褪色，右上角和左下角均有少许破损。从信残留的文字内容分析，应该不是完整版，但前面有多少页，尚无法判断。这封信一直由熊栋臣保存，可惜的是因年代久远，仅剩下一页。新中国成立后，这页烈士家信被

洪湖革命历史博物馆征集收藏，1994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1928年1月下旬，贺龙、周逸群等受党中央派遣，前来湘鄂边发动武装斗争，在监利会见了熊传藻等鄂中特委负责同志，并通过熊传藻，与沔阳、监利、石首、华容等县委取得了联系。在监利朱河召开的各县联席会议上，宣布沔阳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与贺锦斋、吴仙洲等领导的部队合编为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由贺龙统一指挥。其后，熊传藻组织武装游击队，积极配合贺龙、周逸群领导的荆江两岸“年关暴动”，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1928年6月，国民党第十八军纠集地方团防、常练队等在监利、沔阳大举“清乡”。为了反“清乡”，熊传藻将监利境内的游击武装集中起来，成立监利县游击大队。敌人为了扑灭沔阳地区革命烈火，从荆沙方向向监沔沔一带派遣两个主力团，在地方团防的配合下，大举进攻、追剿游击队。1928年冬天，敌军向监利苏区进犯。12月29日，由于县委机关的行踪被叛徒告密，敌军包围了队伍驻地。熊传藻为掩护县委及时突围，腿部中弹负伤，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引诱，熊传藻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任凭敌人的皮鞭、老虎凳、烙铁、压杠等酷刑的折磨，始终没有泄露党的半点机密。1929年1月9日，熊传藻烈士被秘密杀害于监利尺八口，年仅29岁。

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熊传藻等革命先烈，洪湖市人民政府特拨款50余万元，在洪湖市滨湖办事处傅湾村树立“熊传藻烈士纪念碑”，供人们凭吊瞻仰。纪念碑由七块优质花岗岩大理石垒成，坐南朝北，碑高10米，底座2米×1.4米，基座5米×5米，顶层1米×0.8米，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由洪湖籍开国中将黄新廷、杨秀山分别为熊传藻烈士纪念碑题词。

烈士家书述豪情

□ 李圣清